

忧庵集

● 汪庆元 点校

● 戴名世 著

● 黄山书社

忧庵集

戴名世 著

汪庆元 点校

黄山书社

一九八八年·合肥

1201802

责任编辑：何世纲

装帧设计：方绍武

封面题字：黄一民

忧庵集

戴名世著 汪庆元点校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宿州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张印：2,875 字数：58,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

ISBN7—80535—126—0/I·29

定 价：1.95元

戴南山先生稿本《忧庵集》序

吴孟复

戴南山先生《忧庵》一集，虽曾闻有其书，然二百年来无人见之，公私所藏，皆未之有。今得此本，真天下之瑰宝也。

昔望溪先生言“世所见潜虚（即南山）文，多率尔应酬之作，其称意者每桮而藏之，”且“自信为终不沉没”。戴先生之文，雄肆阔深，世已共赞，然犹非其称意者；则其称意者之尤可宝贵，益可知矣。

望溪又言：先生死后“桮藏之文近尺许，淮阴某人持去，或曰尚存”。此集为先生死前数年手定，当在桮藏之中，盖即其称意者也。今果终不沉没；而复乃于垂暮之年得之，何其幸也！

复少读先生之文，即知宝爱。其后负笈梁溪，侍坐于陈石遗（衍）师。陈师论清代古文，盛推先生第一，谓其气盛于望溪，言洁于海峰，格局大于惜抱。又言：先生受祸极酷，然集中实无干犯忌讳之文，惟尝于马通伯（其昶）家见先生手书送张文端公归田五诗，辞气激烈，与集中诸文迥异；意其文必尚有匿而未出者。今读此集，其中之民族意识，民主精华，适与陈师所预测者相符。此集之可信与可贵，益可知矣。

《忱庵集》之名既见于戴存庄先生所述；而集中所叙交游出处，又皆与先生行迹相符；且称谓语气，亦可决其必出于先生之手；而文辞之美，更非他人所能伪为；而况先生身遭奇祸，集为禁书，戴存庄编集时尚隐其名为宋潜虚，岂有人伪托其书哉？原本楮墨陈旧，明为百年前物，其为真品，实无疑义。

汪君庆元青年好学，手录此书，并加标点，遂使沉霾二百余年秘籍，一旦复传于世。复受而读之，大喜过望。因与陶友法、胡士萼、胡贯中诸兄同加审定；赖陶、胡诸兄之大力支持，得由黄山书社出版。此我省整理出版古籍之一大收获也。海内外学人必当同以先读为快矣。

望溪亦有自订文稿一册，旧藏溇沅叔（增湘）家；后归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叔雅先生易簀之前，将其捐献于安徽省博物馆，今尚藏于馆中。包安吴（世臣）自编《小倦游阁文集》卅一卷，其书未刻，仅存其序文于《艺舟双楫》中。别有刊本，惟只二卷，显非其全。闻安徽省图书馆藏有十七卷稿本，惜未得读。此皆文苑之奇珍，乡邦之遗献，其他类此者当犹不少。复老矣，青春受业，皓首无成，惟愿山泽遗书，次第复出，先辈心血，不致沉沦，更期万本流传，助国家文明之盛，是则馨香祷祝者也。

庐江后学吴孟复谨序

前言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南山，又号忧庵，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散文家。只因他是清代文字狱——《南山集》一案的受害者，著作列为禁书，故多散失。他死后一百余年，戴钧衡搜集整理，刊刻成集，然犹隐其姓名，称为《宋潜虚先生集》，不敢用真实姓名。到清末才逐渐使用《南山集》之名。王廷彦在《潜虚先生文集》例言中说：“先生著述甚多，曰《忧庵集》、《问天集》行于世。”但《忧庵集》从无刻本，世间罕见。

一

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此一随笔稿本，即题名《忧庵集》。用行书抄写，字迹隽雅，然间有误字，疑为抄本。书前有作者自序。书中未署姓名，但就其文中内容考证，可以确定为戴名世之作。

一、序中所言“戊子”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是年，戴名世五十六岁。次年中进士；又二年，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始发。戴氏一生确常“岁岁客游”，集中愤世疾俗之语，又明为未第之前所作。其又言“余生长江边，往来江上日久”，“岁壬申，余读书长干寺中”，“余尝由水道自金陵往天津”，皆明出家居桐城枞阳江上，而曾客寓南京者之

口，亦与戴氏里贯游踪相合。

二、书中还有一条已出现“戴田有”三字，且明言“田有”为“余”。同条中还言及方灵皋，即方苞，正是戴的同乡好友。而后文又几次提到方苞，还提到张廷玉等人。考之时、地、人、事，无一不合，故可确信为戴氏所作。

书中杂记见闻，颇见博雅，尤以愤世疾俗，辞气激烈，特别是其中反清之语，比《南山集》中诸作且远过之。文章雅洁，自是桐城本色；然其中有些却近于小说，另一些又颇似明末小品。它的文学价值，它的史料价值，它对研究戴名世，研究“桐城派”，研究清代散文史及当时的社会风俗，都是很有作用的。

二

就书中内容来看，涉及很广。

首先是作者对清朝的态度问题，或者说他的民族观念问题。

以前曾有人认为：戴名世被清王朝处以极刑；但在《南山集》中却看不出其所以致此之由。因为：记了南明政权的某些事实，用了南明政权的年号，这在清初遗老及与戴同时的全望祖等人文中，并非稀见，在康熙自居为“不讳之朝”，自不应因此便受如此酷罚。但戴氏在这里却说了一些很使清王朝忍受不了的话。他借骂历史上曾经“乱华”的异族之人而隐射清王朝。他不但骂为“禽兽夷狄”，还揭露它“以杀人而得天下。”清王朝的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发不留头”，“杀戮到深山”（此句为方以智诗

句),历史的斑斑血迹,都概括在戴名世这“杀人”二字之中。顺治、康熙口口声声说他们“以仁义得天下”,戴名世揭露的正是他们最怕、最痛之处。文中还把他们的统治说成“横行一时”,把其“富贵寿考”说成“不得其情”,且预言其终“必为人所杀”。在清初(特别是康熙末年),反清文字中,语气激烈恐怕更无逾于此者了。

康熙这时正以“博学鸿词科”诱致文人;有些原来不肯屈节的人,这时也转而仕清。戴氏有“与友人书稿一通”,显亦为此而发。他在书中讲自己“欲举只手以障洪流,衔撮土而填沧海……又欲筑意中之园,而著心上之史。”所谓“心上之史”,用的是宋末遗民郑思肖典故,其反清之意亦甚明白。

书中另一则在讲滇黔楚粤之间土司风俗“好报仇”时,原持批评态度,但突然又插入“呜呼,报仇者,天下之大义也。……彼中国之人,于君父之仇不报,且叛而助外人以叛其君父,自土司视之,已禽兽之不若矣。”这也显然是对洪承畴、王铎、钱谦益之降清的谴责。

他记载了不少明末遗闻轶事;对明代的弊政,特别是廷杖,也有不少的揭露、谴责;对李自成、张献忠的活动,亦有所记,其写张献忠之藐视熊文灿,描绘得有声有色。这些皆具有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特别是一些篇中,表现了他从“夷夏之辨”出发,对清王朝及降附于清者之不满,义正词严,为《南山集》中所未有,使我们对他可以进一步认识。

其次是作者对当时士习官风的批判,对八股的批判。

他写出了封建士大夫中一些官迷的丑态。他写当时京师有个李学士,恋官而患得患失,真可谓灵魂毕露。这个李学

士，号愚庵，戴曾在他家教书（见《年谱》），还曾为他写过《李太常案牍序》。李学士确曾“督学畿辅者再”，在任时“于校文之暇，取讼狱之事有涉于士子者，手披目览，务得其情，躬自听断。”做事颇为认真。就是这样的人，也如此热中。人们看来很可耻笑的事，他却津津乐道，恬不知耻。于是未得之先，蝇营狗苟，贿赂公行，既得之后，营私聚财，既贪且吝。戴还写了一位善于钻营而又吝啬成性的漕运总督，他名叫徐旭龄，《清史稿》有传。历史上称为名臣、能吏的，原来竟是这样一些人物。李学士应试时的心情，似《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而这位徐总督的吝啬则和那位为了两根灯草不肯断气的严监生更为相似。

这些封建士大夫利禄薰心，患得患失，因而十分愚昧，十分迷信，戴还写了当时京师士大夫避文字忌讳的例。他描写了当时京师中士大夫生活的一个典型片断，廖廖数语，这位尚书的丑态已跃然纸上。戴名世就是这样随时记录所见所闻，以致于当时京师“诸公贵人畏其口”（《清史稿·戴名世传》）。

戴名世《忧庵集》中这些优秀的史传文，湮没了近三百年，现在我们拂去尘埃，有必要给予其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我国的传记体散文，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开始注意为一些社会中、下层人物立传；史书以外的传记文，发展到唐代，韩、柳古文家把写作对象转向了下层社会的小人物。清代有不少散文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象戴名世这样，在传记文中用如此率直的笔触揭去当朝权贵们道貌岸然的外衣，显示出他们可笑可鄙的灵魂者，却是不可多见。

这些人是在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养成的，是在

贪污成风的环境下出现的。戴名世又写了自明至清的风气败坏的过程，写了“八股”取士制度的敝病所在。他对明清的“取士之法”作了尖锐的批判，把“制义”之弊与官风士习之坏联系起来，就更有意义。

其三，他还写了当时各地的民间风俗(如金陵土俗、苏人好游……)，记下了一些珍禽异兽(如闻香鸟、狒狒)，名贵花木(如海棠、安南花、娑罗树，风兰)，记下了种梧，种竹之法，记下了弋阳、海盐腔到昆曲的发展经过，还有山川名胜之描写与故事、传说的评述。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有些还能体现作者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务实的学风。他特别强调“读书论世，非身尝亲历，未可轻相拟议。”皆能见其治学的精神与态度。

三

戴名世是散文家，本书是其所作散文的一部分。它虽是旅途“随笔”所“书”，但在死前四、五年时，亲手加以整理，经过选择，故在艺术上也是成熟的，比之《南山集》中诸文，并无逊色，且间有过之。

特别值得注意的，⊖其中有些近于或者简直就是短篇小说；⊙另一些与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尤相近似；⊙还有一些寓言性短文，亦见特色。这既体现了戴名世散文的成就，也反映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的渊源，就文学史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一、戴名世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40—1715)是同时代的人物，比《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则

略早一些。上面提到的戴氏所写的李学士、徐总督就很象《儒林外史》中人物。另一段写“金陵人善为面具”，其故事来源显然是采之民间传闻，这和《聊斋志异》的风格是相近的。

闻一多先生曾指出：“明代文学的主潮是小说。《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志》的作者归有光，采取了以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态度和刻画景物的技巧，总算黏上了点时代潮流的边儿(他自己以为读《史记》读来了的，那是自欺欺人的话)，所以是散文家中欧公以来唯一顶天立地的人物。”(《文学的历史动向》)。“桐城派”是以归有光为源的(见《桐城文学渊源考》)，它的艺术技术也就在把小说刻画人物的方法引进散文。戴名世这些亦散文、亦小说的作品，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这对研究桐城派、研究清代散文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小品文是明末清初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它对“五四”以后的散文，还起过不小作用。但“桐城派”特别是方苞却批判了它。可是戴名世这部笔记中，却有不少小品文，一部分是写生活琐事、闲情逸趣的。其和公安、竟陵及明末张岱等人的文风极为相似。

三、还有一些寓言，如“北方多槐”、“树上青虫”等，都具特色。在第一条中，戴氏从“槐衰虫堕”的自然现象联想到社会人事，巧妙地把矛头指向了“蠹国之臣”；第二条从青虫变化而为蝴蝶，想到人的善恶也是可转变的，给人指出向上一路。还有一些谈科技之文，也托意深婉，如“接树之法”一则，由一物悟及物理，由物理悟及人事，其中具有辩证法思想，至足玩味。这些文章，大多清新雅洁，富有

韵味，又充分体现了“桐城派”的特点。

四

书中也有一些封建糟粕，如宣扬封建宗法和迷信思想，如“六顺”、“形家言”（风水）、“雷击”等等，但为数不多。从全书来看，其中精华是主要的；特别是在散文作品与历史资料来看，是很有价值的，不愧为文苑遗珍，书林秘籍。这一秘籍湮没了二百多年，现在我们重新发现了它，这对学术界无疑是件快事。

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点校者曾得到吴孟复教授的热情指教，同时，也因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此书才得以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汪庆元

《忧庵集》自序

余岁岁客游车马之上，逆旅之间，不便观书；则往往于困倦之余，随笔书一二条藏之行笥。或志其本日之所讲说；或追忆其平生之所见闻；或触事而有感。草稿数行，颇无伦次，亦不求工雅，聊以度日而已。性懒不自收拾，散佚者颇多。戊子春，翻阅旧书，于其中得二百余条，因裒而存之。嗣后随笔有记，亦附入焉。

一

鸟之鸣春也，百舌较后，而收声又最早，故百舌性好鸣。天将明，咳咳先百鸟鸣不已者，必百舌也。岁壬午，余读书长干寺中，树木丛茂，飞禽翔舞，而百舌尤多，既与余习，则往往数步外皆来集。一日，群百舌方鸣，忽黄鹂来为数啭，于是万鸟皆暗焉。群百舌以嘴及翅击之使去，复相与音鸣如故。以是知禽鸟之声，皆莫不自得；而妒嫉忌刻，夫物则有故然者矣。

二

余门人广陵韩生为余言：尝读书僧舍，一日闲步阶下，见草间两螳螂，其雌者诱雄者而与之合，明日合如故，熟视

之，则雄者已被雌者食过半矣。已而验之他螳螂，皆然。韩生喟然而叹曰：“为螳螂者，何家无之，可不惧哉！可不戒哉！”然余尝见一书云：“螳螂雄者食雌者，非如韩生所云也。”

三

海外蛮夷之人，雕题黑齿，魑结文身，中国皆笑之。而中国女子之戕贼肢体以为容者，亦习而不之异也。庄子曰：

“为天子之诸御，不穿耳，不爪剪”，是则妇人穿耳自晚周已有之矣。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古之咏美人者，顰笑、态色、眉目、齿颊、腰领、肤泽、鬓发，莫不见之形容，而独不及于足。盖是时必无所为弓步也。毛嫱、西施，其佳丽擅名千古，使生于今日，必以足累其色矣。事固便于所习，而成于所爱，好丑是非乌有一定耶。

四

金陵父老有为余言曰：当明弘光时，寺人得志，势倾朝野，金玉锦绣之遗不绝于道。一阊巷无赖子见而慕之，遂自宫欲求进，疮未合而国亡，其人遂废无用，流落乞食以死。余曰：此等辈盖多有之矣！吾读史至唐之末造，宦官内讧，藩镇跋扈，盗贼蜂起，天下之势亦岌岌矣。而士之营营求进者不止，卒之次第毙于乱贼之手。黄巢将逼潼关，士之候举者赋诗曰：“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看取嫦娥攀取桂，便从陵谷（骨）一时迁。”时文家无人心一至于此！

夫古之盛时，以三公九卿征天下之士，士固拒而不肯出；及其衰也，苟有一命之获，不难屈辱而就之。今夫骨之投于地者，当天气和暖之时，骨皆枯燥，虫蚋蝇蚁过之而不顾；天将雨，湿气上蒸，骨为滋润，于是虫蚋蝇蚁群聚而嘬之，虽驱之不去，少焉时雨降，蚁蚋与骨皆飘流不知所在矣。此人之自宫而卒废无用者，是眈其骨而羡之，而并未常一嘬焉者也。当天气和暖之时，岂复有此等事乎？

五

庄周列御寇之书，滉漾飘忽，若无涯际，不可测；白乐天之诗，清高闲放，勃勃有真气，是二者皆余之所爱也。人情莫不喜生而恶死，而庄、列则以死不足畏，而且以为可乐。吾以知其畏死之甚，乃矫而为爱死之言，则是庄、列于生死之际，可谓色厉而内荏矣。乐天旷怀高寄，跌宕于诗酒之间，其视富贵若敝屣然者，然其于得失之故，悲喜之情，往往见乎辞而不能掩，且其辞又若傲之以为高者。夫其傲之以为高，吾以知其欲得之以为乐也，则是乐天于富贵之际，亦不免于色厉而内荏矣。此三人者，皆不世出之才，而所见仍不能脱然于世俗，如此，自余碌碌者，又何足道乎！

六

为佛之说者，号中国为东土，而西方则佛之所出也。佛言西方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其人无有十缠九恼，苟皈心是土者，念足俱足，则

往生彼国。此欺诳中国愚民之语耳！近代³以来，西方君长闻中国周公、孔子之教，亦颇有向天合掌，愿来世生于东土者。康熙四十三年，遣人入佛国观其风土，自君长以下，通国皆僧衣冠，无不诵经念佛膜拜，而无父子兄弟之伦，如女人人与之合，人止知有母，不知有父，此可谓“极乐世界”乎？彼方思为出谷之迁于木，而此乃欲为申椒之渐于滫，其亦大惑不可解矣。

七

江之北有商人出贩于外，其畜犬随之去。一日，商人泊舟登岸如厕，犬亦随之；及商人欲登舟，犬从后衔其衣，商人骂而蹴之；犬往来厕之左右，顾商人往复不止，商人终不悟。同舟之人不肯待也，遂开帆去。行数十里始悟：如厕时解腰间囊置地上，中有数十金焉。商人顿足叹，已无及矣。久之，商人归至其故泊舟处，登岸徘徊曰：“此吾失金处也！”地有死犬，皮毛且尽矣。曰：“此岂我家犬耶？”以足蹴之，而囊金在焉，封识如故。盖其犬恐人得之，而以身覆盖，遂饿死。列子有言：“七尺之躯，戴发含齿倚而趋者，谓之人，而人未必无兽心；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飞伏走，谓之禽兽，而禽兽未必无人心。”其此之类也夫。

八

女虽丑，览镜必自怜；工虽拙，抚器必自得，盖人情之于己，未有不自信之深者。愚愈甚，则其自信也亦愈甚。吾

尝见有丐相与争，一丐曰：“吾丐多年，丐江楚，丐淮泗，丐潜六，今子甫行乞而傲我乎？”又尝见有穿窬之盗二人，各自夸其盗窃之术。呜呼！世之人扬眉瞬目，顾盼自雄，以为侪辈莫当，而不自知其饮狂国之泉，而入李赤之厕也，岂不悲哉！

九

“葬大夫杨雄死”，此朱子特笔，大义凛然；然洪容斋以为“剧秦美新”，雄不得已而作。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耳。今之布衣寒士，称颂公卿贵人过其实，由容斋之意推之，是亦戏之耳。彼公卿贵人奈何悦其戏已而不悟耶！

十

客有论魏晋以后刘聪、石勒之兴亡及冉闵之事，曰：彼等之有天下，非其幸也。夫以杀人而得天下，其亡也，亦必为人所杀，无噍类焉。曷若逐水草居处，衣皮食肉，子孙世世相保之为乐乎？韩子曰：“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彼虽横极一世，富极贵溢，是亦为不得其情也。

十一

清节实行，乃人生分内之事，寻常之为，非有奇怪可以